

曾岩散文选

ZENGYAN
SANWENX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曾岩散文选

ZENG YAN SAN WEN X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曾岩散文选

曾岩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鞍山市中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245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06-2532-2/I 2254 定价：平 20 元

曾岩散文选

ZENGYAN
SANWENXUAN

我是个军队工作者，转业到地方
七年多。近几年，由于工作繁忙，已
难得有把笔为文。但是课余里（家中大
量的书籍和素材，又使我如醉如痴，
乐此不疲，还占用时间写上几篇。我
是党员，从政和文艺都有相悖，因
为这都是在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

13×13=1.34

82.6.51110

作者手迹



作者近照

作 者 小 传

曾岩，本名董伟。一九四四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现为新民市）。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一九七六年以来，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大量杂文、散文。一九八八年出版杂文集《蔷薇情》，一九九五年出版散文集《屐齿印痕》。现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曾任鞍山市委副书记兼鞍山市人大主任、鞍山市市长等职。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岩散文的艺术格局（序）

王向峰

曾岩已经出版了杂文集《蔷薇情》、散文集《屐齿印痕》。在读过这两本书的基础上，现在又读了他精选上述两著中的作品辑成《曾岩散文选》。我在阅读中感触多发，不禁要写下一些文字，以期与作者曾岩同志和广大读者共同交流。

—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现象：许多不得志的天才，最可怜拉盐车的千里马，时常同声哀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许多未登官位的贫儒，最同情风雨中栖身无处的寒士，时常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如此等等。然而一旦人随势变，换了一个不属于原我的地位，这时，那些得志的天才，自己虽在伯乐之位，却再也不呼唤伯乐了；那些住进朱门的昔日贫儒，虽可泽溉一方，却再也不希求广厦了。这至少说明，身处高位的人与身处低位的人所想各异，倘做文章也是另有关注点，甚至这个关注点似乎也再叩动不出文思了。梁代钟嵘《诗品》记述的“江郎才尽”，杜甫诗中说的

“文章憎命达”，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具象性概括。为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好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导演着，不时地把诗人骚客投入厄运，让他们贫病缠身，命途多舛，贬谪流徙，破国亡家，似因自身的疾苦而看到民众的疾苦，由自身的贫困而关注百姓的贫困——这可真是苦煞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清代文学家赵翼《题元遗山集》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实这幸对作诗乃是幸，但对个人却是不幸，然而当时如果没有这种种不幸却又不能造就出真正的诗人。上述这类现象在过去历史上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也是一种致用的规律性。今天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还有经验在证明，但却不是只有命途多舛才能关注民众，传达民众的心声。因为而今可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平民的心态进行文学创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更能为今天的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作家所可能做到的。曾岩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曾岩同志在他的杂文散文创作的连续年代里，一直在主持一方的党政领导工作，可谓身居要职，权位显赫，但他却写出了这么多好杂文、好散文。我由文章而更觉得其作者的可贵，由作者而觉其文章的难得。因为我们看到某人一篇述说关心科技人员的文章，那可能仅仅是一种呼吁，而由曾岩写出，那也是首先要由他做的事情；由某人写的选贤任能的文章，那可能是希望有司如此行政，而由曾岩写此主题，那也是他能直接做到的事情。因此，对于曾岩来说，他写文章不可能附庸风雅，必得是叫真章、见本色，没有强烈的感触不能写，做不到的不能写，这种特殊身份的作家真是难做的很哩！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说：“孤子语孝，嬖者语杖，贫者语仁，贱者语治。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这是说没有孝养负担的孤儿说孝顺之道，没有钱财施舍的贫儿说仁慈之善，都是

最容易的，没有做的负担，而指向全在对方。曾岩杂文中立意高远的首先都是他要自己做到的；批判否定的，首先都是他要带头扫除的。为此我想，曾岩选择了这种实践性特别强的文体，大概更是要造成一种首先规约自己的文章形式，也是在向社会大众公开了一种共通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实践的感召。《礼记》中说：“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由此看来，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君子是多么不易！而曾岩以文章立言，以行为践言，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敢为君子之风。

二

进入曾岩的杂文与散文中进行考察，在诸多的显著特点中，首先当数他把笔为文时的平民角色效应。在他的杂文中有许多说的是平民关心的事情，并且是站在平民角度，从平民的利害观发言的，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一类，所以这些文章是很能引起广大群众关注与共鸣的。

以怎样看干部里的贪官来说，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大都是顺天理而合人情的公正之见。从民众的立身处看贪官，根本不会有人认为清贫是干部变成贪官的原因。曾岩在《杂感四则》中正作如斯观：“有人把清贫和清廉对立起来，认为收入低，搞不正之风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党政机关干部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就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了。但是，我不解的是，从古至今，所有贪官，都是越富越贪，贪得无厌；而清官却大都清贫，安贫乐道。贪官的贪，并不是由穷所致；清官的廉，也并非由富所养。我并不认为穷则廉，只是觉得穷和贪不是因果关系，富和廉也没有必然联系。以富养廉，不一定廉；清贫也能做到清廉。至于解决工资待遇，那是按劳分配的应有之义。”在这样的文章面前，“以富养廉”论还有存在的余地吗？

再如对于许多爱摆阔气的官，什么事都喜欢有人陪，“陪

吃”、“陪游”、“陪玩”、“陪看”、“陪会”，等等，曾岩在《说“陪”》一文中对此痛加针砭，以类型揭露法扫荡这种积习已久的风气，很能引起人们的深思。且看对陪吃的一段文字描述：“‘陪’吃。这是积久年深的‘陪’。‘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历来是好客的，宁可自己吃糠咽菜，客人来了总要酒肉相待。然而今天的‘陪’吃，已有前无古人之势。档次高、多人陪已不在话下了，仅在陪酒方面就有高深的学问——气氛要异常热烈，时间要漫长持久，劝酒声要不绝于耳，一醉方休才是极致。据说这套复杂的陪酒术已经登堂入室，成了文化体系的一支——酒文化。”文章里的这类事情，非有实际观察研究不能道出；但如无民众的视角，也难以如此憎恶。

鲁迅当年讲过一种“中国的脊梁”精神，这是依存于人民伟力之中的一种坚强不屈的进取精神，如果真正要做一个“放笔直干”的作家，就缺少不了这种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令人高兴的是，曾岩在作文章时，他的双重身份是统一于具有平民心态的作家身上，他的方向创造了他的文章的历史与审美价值。

三

曾岩散文集中的文章大部分属于杂文文体。这类文章都是短章轻便之文，不可缺少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必有敏锐的洞察眼光。这种文体要求，对所写的事情必须一眼就看透本质，笔势一展就能准确地洞穿到底，写出来也不能朦胧隐晦，不宜像其他文学样式那样“余味曲包”，甚至象一首诗有一百样解读法、一个人物形象有一百种接受法那样。

曾岩为文的敏锐洞察力是非常突出的。他不论是对于国计民生的大局，还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小事，不论是作风品德修养，还是待人接物方法，他都能高下在心，巨细洞明，全以一种唯物辩证的分析态度，以致真理在胸，议论切当，不偏不倚，恰得环中。所以曾岩的文章虽然正气充溢，却不发泛泛庸常之见，笔锋尖锐犀利，却没有片面偏执之失。足见他是既有较高文化修养又有较高思想修养的作家。我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问题，是因看到这些年在文艺界、学术界出现的以“片面的深刻”为自慰的思想片面性对人危害甚大，陷入这个怪圈的一些作者、学人，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发展，也贻误了社会，应该引以为戒。我想，凡是重视艺术社会作用的人，凡是尊重自己读者的人，凡是珍惜自己艺术生命的人，都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曾岩有题为《顾此不必失彼》和《这个与那个》的文章，这可以认为是他对全面分析态度的自觉制导的一种宣示。他反对走极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并把这种全面分析的辩证态度引入现实，论列了许多类似“思想万能”和“金钱万能”这样顾此失彼或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流弊。曾岩的杂文起涉生活百态，而态度十分鲜明。历史经验证明，他的认识是全面准确的。毛泽东同志分析过杂文的全面性问题，他说，虽然“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岩的为文实践是很合乎这种高要求的。

四

作为散文分支的杂文与狭义的散文，都属于文学创作门类。它们要求作者之为文，必须具备可以投注到作品对象之中的真情实感，不仅为文之初是有感而发，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必须是体物赋情，使情成体，这是决定写出的文字是不是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曾岩的文学创作，不论写何种文体，都表现了真挚的情感态度，以致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情感态度与他所写的事相，其间不存间隔，使人感到他似乎是忘了自己身份、地位、关系、影响等，这时的他自己就是他作为创作主体的自己，别无其他，所以“笼天地于形内，控万物于笔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放开了自己，也自然就放开了笔。不达于这种境地的创作，就不是进入审美化境从容自得的创造。因为文学之所以成为审美的艺术创造，就在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能把审美的情思融于形象，造成形式，成为对象化着自己也同时对象化着接受者的艺术品，此中如果缺少了情思，尤其是作为审美心理构成中的主要内容情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价值。

在曾岩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为了少点这样的遗憾》的感人文章：作者在看了报载中南矿冶学院半导体材料专家周秋敏临终的遗憾后，心潮滚滚，激愤难平。因为他看到周秋敏为恢复在文革中被毁弃的小实验室，到处求情、作揖、拉关系、跑材料、采购、搬运、安装等等，全得自己去干，直到逝世也没有配齐试验仪器设备，以致赍志而歿，抱憾终生。曾岩这时想到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党委要做科研的后勤保证工作和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工作条件的指示，以及小平同志在科学家面前热情许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的诚恳态度，他这里从对比反差中，自然产生了一种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自问自省，引发出一段情感极为深重的文字：“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变得聪明一些，避免后来者重蹈这样的覆辙。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思想上有没有担任‘后勤部长’的自觉性？行动上是不是肩起了这副重任？效果上做没做到满足给养需要？广大知识分子是‘知恩必报’的，他们愿意为党为人民竭忠尽责，贡献全部才智，我们应该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为他们创造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以使他们尽量少点这种难酬报国之志的遗憾。”这样的感人话语，无需虚比浮辞，完全是靠披肝沥胆的真诚感人。东汉的王充说：“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论衡·超奇》）“精诚由中”，具有天然的诚挚性，这是创造感人文章的先决条件。曾岩杂文与散文全都以此为旨，所以他不写自己无感触、不感动的文章；而凡是他自己有感触和受感动的事情，哪怕在别人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他也写得有情有趣，对此，读者也得承认这是属于他情有独钟的不能不写的事相。他在散文中以动情的笔调写了故乡的古塔，年轻时代承受慈祥祖母的恩惠留下的亲切记忆，外事接触中交下的外国友人的印象，读后也都因为是含情回忆，因而也特别感人。

五

曾岩散文集中主要是杂文。在文学的各类体式中，尤其要求杂文创作者必须广具知识修养，甚至杂文中没有知识的浸润就不能成其为杂文。曾岩的杂文具备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结构，这使他的杂文有条件成为文体杂文，他自身也有资格成为文体作家。

在杂文中，知识具有结构性质，载体性质，以及某种意义

上的内容性质，这些都是构成杂文艺术本体的基本条件。运用得体，则可使杂文显出优越的层次性，并增加对人的吸引力。在这几方面，曾岩显示了自身的优长之处。

杂文是情感与理性交融的文学创作，通常的构成形式是，借助故实以为引端，活用现成材料为针线，让情理运行于可以直感的形象网络中。杂文与报刊短评短论的主要不同点就在这里。不论是历史故实，还是当今已然事实，都是一种社会存在，都属于知识，并且都是为世所有、为人所知的材料，借此行文，很显然能使文章步步有踪。为此，古今杂文大家都不避此法，只是具体各有巧妙。曾岩的杂文在这一点上也很见特色。他以故实为引端的杂文不少，以现成材料为缝合针线，把文章的分体结构联成整体结构的也有许多。他的《用人二十戒》，以古语“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为戒鉴，论列了二十条可为戒律的细目；而二十条的每条开头，差不多都有“戒楚才晋用”、“戒用违其时”、“戒求贤不切”、“戒良莠不分”等方面的史鉴或史训知识材料，把要说的道理衬托和联缀得极为自然，使人既学知识，又增修养。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中说：“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曾岩引用事类达到了这个层次。

以知识为载体的杂文，这是更胜一筹的作品。因为这种杂文表面是在说着离题旨极远的事情，或古代，或外域，或鬼神，或自然，但这些事情的内含之理却与文章主题指向有同构性，是道通为一的关联体，在能指之外令其专有所指。所以会做文章的人，可以秘响旁通地以不写为写，以写为不写，行无辙迹地写着自己的文章。曾岩的《孔明也有不明处》、《想起了沙和尚》等篇，都有这种行文的妙处，通篇是说着孔明、沙僧，但把今天的领导者行令执法应铁面无私和用人要看重开拓进取性的大旨，全用超象显现的方法生动地写出来，孔明之事、沙僧

之事成了载体，这就是“超以象外，待其环中”。

知识成为杂文的内容，这是从两重意义上说的：一是杂文的内容构成中有大量的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往往成为杂文的重要内容；二是有些杂文就在一个特定指向下说着有关的知识，这专向知识的汇聚就成了杂文的题材内容构成。曾岩的《有感于“请鸭嘴兽原谅”》，说的是恩格斯对鸭嘴兽的生蛋本能习性从否认到承认的情况，肯定恩格斯据实修正自己的认识作风。这是在传达一种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在说明一种历史经验教训。这些就成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事实内容。不写这些知识就没有这篇杂文的题材内容。同样在《事业的位置》一文中，讲的关于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土壤学家侯光炯、化学家诺贝尔等人潜心于事业，献身于科学的本事，首先都是知识把他们敬业事迹组接在一个主题之下，也就使知识成了杂文的内容。这内容不仅是题材内容，还同步具有主题的意义所在。

六

文学的文章都是由其最小的分子字、句、段构成的浑然一体的系统。其既成体是由熔裁而成，是靠人工而达于自然。古人说“文章本天成”，紧跟着还有一句“妙手乃得之”。妙手在于法天贵真，熔裁自然，创作主体的超越意义也在这里。曾岩的散文与杂文有精心的章句熔裁，可以说不论是篇章还是字句，都能见出他的审美创造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他为文时，力求章短意盛，酌事取类，置方有位，在自然朴素的运行中，造成审美动情力，很有某些道家美学的“大巧若拙”的意味。

文章之作有长短，谁也不能由长短本身而判定优劣。评价的标准要在辞达而理举，需长则长，应短则短。曾岩的文章是在应短的方位上，注意贯注有更充沛的思想情感，使他在著文时，可以“舒华布实，献质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研，故能

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文心雕龙·熔裁》）他的访日散文《市民欢迎会》是写尼崎市民对鞍山市访问团的热情接待的，文中选写了四件事，其中有四个人，他们都与鞍山有特殊历史关系，这无疑是题材的重点，而其中尤以在鞍山居住多年那位每有鞍山人到尼崎必来一见的妇女为着墨最多的描写对象。全文读起来不落篇章结构之相，只觉情思的存在，可谓章短意盛的散文。他的速写性的散文《四位市长》，内用四个小标题来标示四位市长的突出个性存在：“自负的洗烈先生”，“稚气的方明伟先生”，“幽默的雷根先生”，“烦恼的尼克兹”。而文章重点也在展示这种画龙点睛的个性特点，对其描述各自仅用了三百多字，但却形神毕肖，读过不忘，很得《世说新语》一类笔记小说的即事状人之妙。那位加拿大怡陶碧谷市市长洗烈先生，当过教授，读过《老子》，他谈及特长，颇为自负：“鄙人什么都会。在学生面前，我是教师；在士兵面前，我是军官；在被告面前，我是律师；在病人面前，我是医生。”此人出语惊人，句句珠玑，在文中人物神情辐射纸外，活灵活现，其功全在作者的文字传达。

不论写杂文写散文，都有取材料入篇章的问题。不会写作的人或不知写作轻重的人，都好堆积事类，结果使文章或事类繁复，或钉钉堆垛，失去了为文的宗旨所在。刘勰有针对性地指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文心雕龙·熔裁》）按这种“三准”原则看曾岩的杂文与散文，可以发现他是很自觉地在文章中制导着自己对于事类材料的运用：无卖弄，不做作，坚持不恰当的不用，不需要的不用，所以看其对故实的使用，他不掉书袋，不想把自己知道的事类倾囊而泄，他也不